

◎ 大师书斋



梁启超

精读梁启超

大师书斋

精读梁启超

● 鹭江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精读梁启超 / 刘琅主编. —厦门: 鹭江出版社, 2007. 8

(大师书斋)

ISBN 978-7-80671-466-9

I . 精... II . 刘... III . 梁启超 (1873~1929) - 文集

IV . B259. 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94137 号

精读梁启超

刘琅 主编

出 版 / 鹭江出版社

地 址 / 厦门市湖明路 22 号

邮 编 / 361004

电 话 / 0592-5046666 0591-87539330 010-62376499

印 刷 / 北京京华印刷制版厂

开 本 / 635×965 1/16

印 张 / 23.5

版 次 / 2007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80671-466-9

定 价 / 30.00 元

(如有印装错误, 请寄印刷厂调换或致电鹭江出版社。)

梁启超先生学行小传

夏晓虹

梁启超先生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笔名有哀时客、少年中国之少年、中国之新民、沧江等多种。清同治十二年正月二十六日（公元1873年2月23日）出生于广东新会县熊子乡茶坑村，1929年1月19日病逝于北平协和医院，得年仅57岁。其家族于2月17日开吊，北平各界与广东旅平同乡会亦于是日假广惠寺举行追悼大会。同时，上海各界由陈三立、张元济主持，于静安寺设席公祭。

梁姓自北宋始由秦地同州迁入广东。先生祖上居茶坑村，十世皆务农，至祖父维清（号镜泉）先生，方有志向学，捐为附贡生。先生幼时，于诸孙中最得祖父喜爱，日则教读，夜则随寝。熊子为一小岛，地当西江入南海口，南距宋帝赵昺自沉殉国之崖山约七里。祖父每与儿孙讲说南宋故事，“以宋、明儒义理名节之教贻后昆”（《哀启》）。父宝瑛先生，字莲润，亦习举子业，不得售，遂教授于乡里。先生兄弟少时，均普由其父亲教。而初识字之启蒙老师，则为其母。其家教慈而严，不以常儿视先生。

先生生性聪慧。4、5岁开始读书，即习“四书”“五经”，接受中国传统文化教育。17岁中举，可谓少年得志。此前两年，已就读于阮元创办之广州学海堂，治学之范围与兴趣亦随之由帖括转为词章、训诂。18岁时，其人生道路发生变化。此年入京会试，下第途经上海，购读《瀛环志略》并接触西学译书，为之敞开了走向世界的大门；同年，谒见康有为，拜服师从，又为之开启了研治新学的大门。次年，入康氏设教之万木草堂学习。草堂教育“以孔学、佛学、宋明学为体，以史学、西学为用”（《南海康先生传》），借公羊“三世说”宣传维新变法，予先生影响至深，自谓“一生学问之得力，皆在此年”（《三十自述》）。

甲午战后，激于国变，先生奔走南北，著书授课，一以救国为务。先

后参与公车上书、强学会、湖南新政、保国会、请废八股、戊戌变法等一系列改良主义政治活动，并担任上海《时务报》主笔，发表《变法通议》等大批政论文，编著《西学书目表》，力倡引进西学，变法图强，势在必行。其文风靡全国，一时声名鹊起。又赴长沙，主讲时务学堂，培植维新人材，使湖南风气大变。

变法失败，先生东渡日本，开始长达 14 年的流亡生活。赴日之初，即热中于学习日文，广泛浏览日本的“洋学”书籍，受到明治文化的冲击，“思想为之一变”（《三十自述》）。居日期间，仍热心政治活动，组织保皇会，成立政闻社，从事立宪运动，为此数次离开日本，赴檀香山、新加坡、澳洲、美洲等地。其中 1903 年的美洲之行，使其思想由激进转为保守，反对流血革命，坚持君主立宪。而其用心最多且成效最大者，实为办刊撰文，对国人进行思想启蒙。先后创办了《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以“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的“新文体”（《清代学术概论》），宣传新思想、新知识。借撰写西方思想家学案，大量介绍西方政治学说及其他学术思想；而批判中国的封建专制与旧学，讲求“新民”之道，倡导文学改良运动，均表现出极强的开创性。所著《中国积弱溯源论》与《新民说》，最早系统检讨了国民性问题，至今仍富有启示意义；《新史学》以“史界革命”为旗帜，为中国现代史学的建立初步奠基；《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对中国学术史首次作科学的研究，为后学提供了具体的治学范例。即使一向被视为“余事”、“小道”的诗文、小说，先生亦郑重对待，除发表《饮冰室诗话》、《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诸文，阐述“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思想，更身体力行，创作《二十世纪太平洋歌》等新体诗、《少年中国说》等新体散文以及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未完稿），对改变文学风气大有助益。

民国建立，先生遂即归国，历任袁世凯政府之司法总长、币制局总裁及段祺瑞政府之财政总长，并策动反对袁氏称帝的护国战争，参与讨伐张勋拥清帝复辟的战役。1917 年底，自觉只能做“理论的政务家”，不能胜任“实行的政务家”之职，因而退出政界，基本结束前期显赫而并不成功的政治生涯。

随后，先生出游欧洲各国，增强了以中国文化救世界的信心。1920 年回国后，虽仍不免就时事发表意见，却谨守社会名流身份，取独立超

脱姿态，倡导国民运动，抨击时弊恶行，大部分精力与时间则用于讲学与著述。对新文化运动并不抵触，迅即改用白话文写作。又举办多项文化事业，如组织共学社，刷新《改造》杂志，出任京师图书馆馆长，并热心于到各地进行学术演讲。晚年，除在南开大学、东南大学、北京大学等校兼课外，主要执教于清华学校，为该校国学研究院著名的四大导师之一。著作亦以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最用力，撰有《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等力作。临歿前 3 个月，仍奋力执笔，编订《辛稼轩先生年谱》，终于不起，真正实践了其“战士死于沙场，学者死于讲座”之言。

先生自认“学问兴味政治兴味都甚浓；两样比较，学问兴味更为浓些”（《外交欤？内政欤？》）。而由于时势变迁，前期著述只求觉世，故以政治家身份而论学，开通民智、变法图强为其最高宗旨；后期著述意在传世，故主张纯粹的学者态度，终以人格修养为归宿。贯穿其间的“新民”课题，也因此呈现前期的重在批判、取法西方与后期的重在表彰、取法传统之不同。沟通二者的根基，则在于对现实人生的关怀。

先生治学，气魄宏大。早年作《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拟分 16 章，已露端倪；晚年亦有写作《中国学术史》、《中国佛教史》等庞大计划，而总其成者为《中国文化史》，《中国通史》则为其终生念念不忘的事业。所遗留之《中国通史》与《中国文化史》全目，涉及面之广博，令人惊叹。凡此均因其兴趣多变、精力不济而无一完成，又令人叹惋。

正如郑振铎先生所言，先生后期的学术著述，大致是前期研究题材的深入与放大（《梁任公先生》）。诸如诸子学、清学、佛学、文学，此时均有专门研究，而尤以史学为大宗、为指归，其伏脉则皆可追溯到《新民丛报》时代。相对而言，先生后期的著述更谨慎、细致，注重系统性与科学化，摆脱了乾嘉考据学派细碎、繁琐的狭小格局，而代之以成型的理论框架结构材料。从定义入手，经过论证，作出判断，从而使学术研究进一步规范化。在论著中，先生又每每强调方法的运用得当，如以问题、时代、宗派三种研究法的交叉使用为其学术史撰述的基本策略，便可收提纲挈领之效。其毕生所求乃在“凭借新知以商量旧学”（《墨经校释序》），此为先生治学一以贯之的内在理路。是其学虽多变，而自有不变者在。

先生一生笔耕不辍，著作等身，字数总计在 1000 万言以上。后死友

林志钧所编《饮冰室合集》40册，卷帙浩繁，仍搜罗未备。因写作速度快，不免有粗疏、草率处，为白璧微瑕。

其性格喜新善变，本无成见，名言为“不惮以今日之我与昔日之我挑战”（《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政治主张之多变尝为人诟病，而能随时进步，实为其长处。学问上亦不肯故步自封，每喜推陈出新，以是开后人治学诸多门径。其为人热情坦诚，文字亦平易畅达，虽作专门研究，仍时刻不忘文化普及工作。

目 录

梁启超先生学行小传 夏晓虹 / 1

一、专 著

中国历史研究法 3

自序	5
第一章 史之意义及其范围	7
第二章 过去之中国史学界	12
第三章 史之改造	31
第四章 说史料	39
第五章 史料之搜集与鉴别	63
第六章 史迹之论次	95

新史学 120

中国之旧史	121
史学之界说	127
历史与人种之关系	131
论正统	139
论书法	145
论纪年	149

二、文 论

论学会 155

目录

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	159
政变原因答客难	163
论公德	168
论进步	173
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	184
论立法权	190
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	196
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	200
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	207
论不变法之害	215
续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	221
少年中国说	224
保教非所以尊孔论	229
释革	238
痛定罪言	242
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	250
人生观与科学	255
惟心	260
文明与英雄之比例	262
倡设女学堂启	264
成败	266
文野三界之别	268
干涉与放任	270
三十自述	272
学与术	277
学校读经问题	280
为什么要研究儒家哲学	282
儒家哲学的研究法	286
儒家哲学是什么	292
呵旁观者文	296

敬告国中之谈实业者	301
情圣杜甫	310
人权与女权	323
美术与科学	328
美术与生活	332
敬业与乐业	336
为学与做人	340
治国学的两条大路	345

附 录

梁启超先生学术年表	355
-----------------	-----

目 录

一、传署

中国历史研究法

自序

中国历史可读耶？二十四史两通鉴九通五纪事本末乃至其他别史杂史等都计不下数万卷，幼童习焉，白首而不能殚，在昔犹苦之，况于百学待治之今日，学子精力能有几者？中国历史可不读耶？然则此数万卷者，以之覆瓿，以之当薪；举凡数千年来我祖宗活动之迹足征于文献者，认为一无价值，而永屏诸人类文化产物之圈外；非惟吾侪为人子孙者所不忍，抑亦全人类所不许也。既不可不读而又不可读，其必有若而人焉竭其心力以求善读之，然后出其所读者以供人之读，是故新史之作，可谓我学界今日最迫切之要求也已。

近今史学之进步有两特征。其一，为客观的资料之整理：——畴昔不认为史迹者，今则认之；畴昔认为史迹者，今或不认。举从前弃置散佚之迹，钩稽而比观之；其夙所因袭者，则重加鉴别以估定其价值。如此则史学立于“真”的基础之上，而推论之功，乃不至枉施也。其二，为主观的观念之革新：——以史为人类活态之再现，而非其僵迹之展览；为全社会之业影，而非一人一家之谱录。如此，然后历史与吾侪生活相密接，读之能亲切有味；如此，然后能使读者领会团体生活之意义，以助成其为一国民为一世界人之资格也。欧美近百数十年之史学界，全向于此两种方向以行。今虽仅见其进未见其止，顾所成就则既斐然矣。

我国史界浩如烟海之资料，苟无法以整理之耶？则诚如一堆瓦砾，只觉其可厌。苟有法以整理之耶？则如在矿之金，采之不竭；学者任擗治其一部分，皆可以名家；而其所贡献于世界者皆可以极大。启超不自揆，蓄志此业，逾二十年，所积丛残之稿，亦既盈尺。顾不敢自信，迁延不以问诸世。客岁在天津南开大学任课外讲演，乃裒理旧业，益以新知，以与同学商榷。一学期终，得《中国历史研究法》一卷，凡十万言。孔子曰：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吾治史所持之器，大略在是。吾发心殚三四年之力，用此方法以创造一新史。吾之稿本，将悉以各学校之巡回讲演成之。其第二卷为《五千年史势鸟瞰》，以今春在北京清华学校讲焉。第三卷以下以时代为次，更俟续布也。

顾兹事体大，原非一手一足之烈所能为力；况学殖浅薄如启超者，重以讲堂匆匆开演，讲义随讲随布，曾未获稍加擘勘，则其纰缪舛误矛盾漏略之多，又岂俟论。区区此稿，本宜坚鎔之以俟他日之改定。既而复思吾研究之结果，虽未必有价值，其或者因吾之研究以引起世人之研究焉，因世人之研究以是正吾之研究焉，则其所得不已多耶？故贸然刊布而字之曰《史稿》。孟子曰：“取人为善，与人为善。”^①吾之此书，非敢有以与人也，将以取诸人而已。愿读者鉴兹微尚，痛予别裁，或纠其大端之谬，或绳其小节之疏，或著论箴驳，或通函诲责，俾得自知其失而自改之，由稿本蜕变以成定本，则片言之锡，皆吾师也。十一年一月十八日启超自述。

① 《孟子·公孙丑上》原文作“取诸人以为善，是与人为善者也”。

第一章 史之意义及其范围

史者何？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其专述中国先民之活动供现代中国国民之资鉴者，则曰中国史。

今宜将此定义分析说明：

一 活动之体相：人类为生存而活动，亦为活动而生存。活动休止，则人道或几乎息矣。凡活动，以能活动者为体，以所活动者为相。史也者，综合彼参与活动之种种体，与其活动所表现之种种相，而成一有结构的叙述者也，是故非活动的事项——例如天象地形等属于自然界现象者，皆非史的范围；反之凡活动的事项——人类情感理智意志所产生者，皆活动之相，即皆史的范围也。此所谓相者，复可细分为二：一曰活动之产品，二曰活动之情态。产品者，活动之过去相，因活动而得此结果者也。情态者，活动之现在相，结果之所从出也。产品者，譬犹海中生物，经无数个体一期间协合之嬗化而产出一珊瑚岛，此珊瑚岛实经种种活动情态而始成。而今则既僵矣，情态不复可得见，凡史迹皆人类过去活动之僵迹也，史家能事，乃在将僵迹变为活化——因其结果以推得其情态，使过去时代之现在相，再现于今日也。

二 人类社会之赓续活动：不曰“人”之活动而曰“人类社会”之活动者，一个人或一般人之食息生殖争斗忆念谈话等等，不得谓非活动也，然未必皆为史迹。史迹也者，无论为一个人独力所造，或一般人协力所造，要之必以社会为范围；必其活动力之运用贯注，能影响及于全社会，——最少亦及于社会之一部，然后足以当史之成分。质言之，则史也者，人类全体或其大多数之共业所构成，故其性质非单独的，而社会的也。复次：言活动而必申之以“赓续”者：个人之生命极短，人类社会之